

突之火难以熄灭,妄图“消灭”弱者的地区强国称霸之心时隐时现,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有外交努力几乎未有任何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质性成效。美国控制这一地区,除了可以顺势推进中东、中亚一体化与民主化努力外,还可震慑地区强权,从更大意义上讲甚至可遏制更大的潜在战略竞争者。

三是能源考量。中东作为世界的储油库对各国的利害关系不需多言。尽管从该地区进口的石油只占美国进口总量 20% 多一点,但中东地区局势的可控对世界能源的稳定供应乃至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利害关系。中东能源所衍生的地缘战略意义实在不可低估。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存在随时可以转化成政治与外交资源,任何产油国都不得不考虑这一点,而这正可构成美对能源进口国不可忽视的战略筹码。

四是实现适应新时代特征需要的军事置换。前太平洋总司令布莱尔调任美中央司令部司令意味着美国可能实行一种多管齐下的战略,布莱尔的布什路线立场虽然坚定,但任太平洋总司令的经历让他多了一副首先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面孔,也让美国外交多了一份可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依笔者看来,中央司令部的未来可能更多服从一种美国应付当务之急的需要,即反击恐怖主义构成的危害。美国学界酝酿的“中东北约”——MATO(即“中东反恐条约组织”)就十分可能分化中央司令部的部分功能,而

将矛头对准伊斯兰极端势力。如果美军续留伊拉克,对酝酿成形的 MATO 可能是一种后备的军事定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军不仅不会撤出伊拉克,而且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从战略意义考量,美国在伊拉克维持有限规模的驻军几乎已成定数。

仅就伊拉克问题本身而言,布什政府可能确已身陷困局,但从美国全球大战略讲,伊拉克对美国而言还是小菜一碟,美国并未因小失大。伊拉克也没有拖住美国全球地缘战略部署的后腿,美国利用反恐之机取得国内支持,维持了近 5000 亿美元的庞大军事开支;加强了与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突破了俄罗斯的“天然边界”,引发俄的战略反弹,美俄矛盾仍在深化。从更大层面而言,美国发动伊战造成的大国分裂已成往事,随着德法新领导人登台,所谓的“新老欧洲”界线重归模糊,修补与美国的关系正成为德法新领导人首选的外交课题。这有助于加强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的团结。当然,时移势易,世界变了,这种可能重现的西方团结并不一定要针对非西方国家,但它拥有一种巨大的战略能量,至少在应对全球重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如在反恐、全球变暖、促进经济与应对各国社会转型造成的矛盾等问题上,西方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合力。这值得警惕,但不宜过分解读。○

美国能从中东脱困吗?

李 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所长 研究员)

伊拉克战争已过去四年。四年间,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虽有过转瞬即逝的胜利喜悦,但更多则是在伊拉克的战乱泥潭中痛苦挣扎。如今,伊拉克已成为美国人心最大的“痛”。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为了巩固其“独大”地位,塑造美国治下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新秩序,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但世界“老

大”的地位刚刚坐稳,“9·11 事件”就将美国人打懵。出于强者受到强烈刺激后的本能反应,美国开始进行激烈的报复。布什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大规模反恐战争,将主要矛头对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先发制人”理念指导下,美又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回过头来看,美国出兵阿富汗至少还师出有名,但伊拉克战争却既无法律

依据又无合理理由。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当时的战争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正是这个错误将美国拖入了中东这滩“浑水”。如今,美国在一些新老结构性矛盾编织的战略困局中欲罢不能,处境十分困难。

首先,美国全力投入反恐,却无法解决反恐与“越反越恐”的悖论。对美国人而言,“9·11事件”是切肤之痛,“恐怖主义忧惧症”至今挥之不去。反恐至今在美国仍有广泛共识,是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中心任务,也是布什政府制定各种内外强硬政策的主要依据。但美国反恐的战线日益扩大,从“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到“邪恶轴心-暴政前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形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打击链,战场和目标越来越模糊。如今“基地”的影响已扩散至整个中东,暴力与恐怖活动覆盖面不断扩大;伊拉克已成为恐怖主义活动大本营;阿富汗塔利班僵而不死,又开始复苏;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具挑战性。布什政府既不能放弃反恐,又看不到尽头,长期困扰于“恐怖-反恐-恐怖升级-反恐升级”的恶性循环。

其次,美国致力于在全球防止核扩散,却无法解决防扩与核扩散威胁加大的现实矛盾。美国长期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坚定捍卫者自居,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和打击一些国家求核的愿望和行为。但它在自己的核问题上却一直实行双重标准:一是为强化核威慑能力,公开宣布要研制和发展小型核武器,必要时对国际恐怖主义和一些“邪恶”国家实施核打击;二是在伊核危机极其敏感的时期,积极与印度开展核合作,加之长期默许以色列拥有核武,不但使其维护核不扩散的努力和效果大打折扣,而且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在中东地区,随着伊核危机的不断升级,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核风潮”。2006年3月,阿盟秘书长穆萨在阿盟首脑会议上公开呼吁阿拉伯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行列,早日“迈入核俱乐部”;9月,阿盟外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阿拉伯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加大核技术研究。此外,埃及、沙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阿联酋、突尼斯均公开表示要发展民用核能。2006年12月,海合会6

国首脑会议也决定要和平利用核能,并着手制定联合发展核能计划。阿拉伯国家人心思变、“求核”欲望蔓延,中东长期坚持的无核化局面面临瓦解的危险,美国对中东的控制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

再次,美国大力推行中东改造计划,却难以解决中东“民主化”与伊斯兰激进势力坐大的矛盾。布什坚持西方“自由民主”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本途径,“9·11事件”后在中东大张旗鼓地推行民主,结果导致美国中东政策的一系列“错位”:一是为中东长期处于蛰伏和非法状态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了扩张影响的“新舞台”;二是通过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压叙利亚等,极大地削弱了该地区长期阻遏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世俗力量,使后者坐大有了可乘之机;三是沙特、埃及等温和阿拉伯国家在美压力下,不得不在国内反恐和推行民主,导致激进势力重趋活跃且与政府的冲突增多,国内局势日趋动荡。如今,中东世俗力量受挫,民主力量薄弱,民族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继续推进“民主改造”可能引发中东新一轮伊斯兰复兴浪潮。

最后,美国将保护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作为基本国策,因而长期无法解决偏袒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反美情绪不断高涨之间的矛盾。不少阿拉伯人认为,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为以色列人打的,是为改善以色列的生存环境而采取的战略步骤。特别是在黎以冲突中,美国无视国际法准则和公理、道义,公然支持以军对黎巴嫩城市进行持续的狂轰滥炸,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正在不断地损害、消耗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本。伊拉克战争以来,美政界和学界均有人开始反思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甚至大胆建议政府调整袒以政策,以解美国中东之困。但布什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改变这一既定政策。因为,美以特殊同盟关系形同“父子”关系。一方面,以色列在中东一直充当美国的战略支柱和“民主航母”,是美国长期控制和主导中东至关重要的“小伙伴”;另一方面,数百万旅居美国的犹太人不但不同程度控制着美国的金融、新闻等重要行业,在政治上也形成了强大的院外集团,对美国政府保持着强大影响力,以至于在国际上有“控制世

界的是美国,而控制美国的是犹太人”之说。对美国来说,偏袒以色列已成为一个政策“死结”,根本无法解开。

以色列著名中东问题专家萨瑟曾告诫大国不要轻易进入中东和试图改变中东,因为,真正能改变中

东格局的“大玩家”只能是本地区的大国。历史已经证明,中东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对美国来说,中东已成为其霸权战略的陷阱。美国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或调整其现行战略,就很难从中东彻底脱困。○

目标困境是当前美国的战略困境之一

孟祥青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表面上看,伊战四年后的今天,美国有得有失。“得”表现在:拔掉了萨达姆这个“钉子户”,拆散了中东反美、反以抵抗阵线,在中东地缘战略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建立美国治理下的中东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新模式——伊拉克模式;“失”表现在: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泥潭”。四年后的伊拉克,武装冲突不断、教派矛盾激化、恐怖袭击如家常便饭,美国在战前为伊拉克和世界人民所描绘的“自由、民主、繁荣”的景象不仅没有到来,而且相去甚远。美国不得不将其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于此。

2006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使民主党全面掌控了国会,形成了对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某种牵制,促使布什不得不在伊拉克问题、中东政策以及与盟国关系上作出一定调整,但所有举措都未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处境:以巴矛盾难以化解、伊朗核问题日益凸显、伊拉克前景仍然黯淡、美国大中东和平计划事实搁浅。所有这些一再表明,美国遇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战略上的巨大困境,而这个困境的最突出表现则是战略目标的迷失。

对大国来说,战略选择一定意义上就是目标选择,确立适当的目标是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关键。目标的偏移和失位,将导致战略行动的盲目和失败。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曾以越南战争为例,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得失。他认为美在越南的失败,在于夸大了所谓“共产主义侵略”,“本国国家利益被忽视,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政府的、独立的越南’”。目标的错位,不但使美国陷入

“越南泥潭”,而且多年困于“越南后遗症”。美国政府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军事上不得不全面收缩,政治、军事危机与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交织在一起,使美国陷入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谷期。

现在的“伊拉克泥潭”和当年的“越南泥潭”具有本质的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但有一点相似之处,即目标的迷失。如果说,当年美国发现利益目标失误,重新对国家利益作出判断,并改变最初目标,从越南脱身,使美国重新获得了一定的主动,那么,今天的美国面临着明知目标难以实现却又无法调整它的巨大困境,美军近期不大可能从伊拉克撤出。

当年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确立的目标可分解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推翻萨达姆统治,按照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伊拉克;第二步实现所谓“大中东和平计划”;第三步整肃伊斯兰。现在,第一步只完成了半步,剩余的半步短期内看不到希望,第二、三步就更加遥遥无期了。所以,四年后的美国不再谈“大中东和平计划”,如何使伊拉克稳定下来则成为当务之急。

一个大国当难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自己的战略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运用实力的谋略和水平,这实际上是解决战略手段问题。战略实施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和相互协调。目的必须与现有的手段相适应,而手段也必须合理。柯林斯也指出,“目的(利益和目标)和手段(现有的各种力量)的脱节会产生难以估计的风险。”可见,难以实现目标往往是因为能力不足,所以在短期内提高并动员一切力量